

为了方便同学 所售物品价格低于市价

11月8日下午2点半,同学们正在上课,义卖站的小货架静静地伫立在无人的走廊。一个拎着大包小包的男生,向义卖站走来。笔、本、面巾纸、便利贴……他打开包裹,掏出各种各样的文具用品和生活物品,逐一摆上货架。1元、5元、0.8元……这些物品,被各种价签分成类别。

来的男生叫崔晨,是义卖站的“采购员”,也是主要的管理者之一,他是吉林财经大学税务系大二学生。义卖站是吉林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团委设立,由学院的学生会同学管理的。“每周三下午第一节,我都没有课,我就在这个时候到市场去进货。”崔晨拆开一包面巾纸,一包一包地摆上货架,面巾纸的价钱,写着“0.8元”。“这种面巾纸,市面上零售价格是1块钱。”崔晨说,开办义卖站的初衷之一,就是为了方便同学,所以上架的货品,都比市面上卖的便宜。崔晨拿出一个精美的笔记本:“比如这个本,市面上卖6块,这卖5块。”

架上的物品,种类挺多。崔晨算了算,“大约30多种。”这些都是出售的。义卖站还有出租的物品,是摆在底下的几本图书。“这些书,都是同学和老师捐的,用来出租,租一天2毛钱。”除了需要花钱的物品之外,货架一侧,挂着一个篮子,里面有一把剪刀、一个订书机、一瓶胶水,这些都是免费供大家使用的。

买与借,如何统计?挂在货架边的一个本子,记录了一切。那是一个购物登记簿,里面是一张张表格,标明院系、姓名、所购物品、数量、日期,买东西的同学,会主动在上面登记。翻开登记簿看了看,已经记录了大半本。

大学里有个义卖站 无人售货全凭诚信



吉林财经大学第一教学楼的走廊一角,有一个名为“大诚小爱”的义卖站。从今年2月27日开张开始,始终无人售货,完全凭着诚信发展到今天。在过去9个多月的时间里,义卖站发生过不少动人与曲折的故事,它成为一道道德“测验题”,面对这道题,同学们给出了形形色色的答案。

透明化经营 定期公示收支账目

每天早上7点前,负责管理义卖站的同学就会来到站里,摆好货品;晚上9点,再来把货收起来。崔晨说,每隔三四天,他们都会来一次货,算算账。“货多的时候,每天都卖80多元呢。”小站还是透明化经营,定期公示收支账目,进货款、利润等,都写得清清楚楚。

“小站建立初期,是学院的团委拨下来的启动资金,几百元。”



义卖站就在第一教学楼的走廊一角

崔晨说,经营了一段时间之后,义卖站盈利了,他们就开始自收自支,用卖货款进货,赚得的利润,注入学校的阳光基金。“上个学期,我们获得了近400元的利润。”崔晨很高兴,这些钱,他们捐给了一名贫困儿童。

道德测验 有人多给钱有人不给钱

义卖站伫立在这个角落9个多月,它成为同学中的一个道德“测验题”。学院团委书记宋立东

说,小站能顺利经营到现在,凭借的都是同学们的诚信和善良。“时常会有同学来买东西,投到钱箱里的钱比东西的价格要多很多。”宋立东说,大多数同学面对义卖站,都会真诚相对。

但是,偶尔也会有同学拿了东西,却没有付钱。“有时候,同学买东西,钱的面额大,零钱盒里都是小额硬币,找不开,或者忘记带钱,他们都会在旁边的留言簿里,说明情况,下次来还。”崔晨说,大多数情况下,同学们都会补上,但是有些时候,的确没有下文。

前段时间,二学历考试的时候,不少从四面八方而来的学生或社会人员,来学校的考场考试。“考试之前,我们曾经商量过,这两天要不要把义卖站的货撤下来,但是我们没有这么做,它的存在,并不是为了考验大家,而是基于信任。”然而,令宋立东和同学们寒心的是,那两天,货架的物品消失了,钱箱里的钱却没有增加。“这次我们损失了近200元。”

义卖站这次受损失,令负责管理的同学们沉默了很久。但最终,他们还是决定,要把小站坚持下去。“我们学校以财经类专业为主,毕业之后,同学们从事的社会职业,几乎都和金融分不开。”宋立东说,他希望通过这个小站,给同学们一个道德的标杆,在面对金钱的时候,该保持怎样的态度。

同学力挺 是心灵的救赎与洗礼

11月8日下午,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,遇到好几位同学在义卖站买东西。一个男生买了一包8毛钱的纸巾,向钱箱里投了一块钱之后,转身就走,没有拿走零钱。

“这个小站立在这,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习惯。”学生陶文经常在小站买东西,她说,她偶尔也会多投一些钱,因为她知道,这些钱会被用作爱心捐款。“小站信任我们,我们也支持小站。”

挂在义卖站的留言簿,已写满了好几本。崔晨和同学们看遍里面的每条留言,充满了感动。他把晒在学校贴吧里的留言内容展示给记者看,同学们都在力挺义卖站。有条留言写着:“我觉得每个路过这里的人,不管是否买东西,都是一种心灵的救赎与洗礼。在这个日益浮躁、面临种种诚信危机的社会,这里无疑让人内省,触摸到人性最本真的一面。”据《新文化报》

张永兴生在富民,祖上都是文化人,对后代的教育极为重视。父亲要求张永兴在劳作之余,多读书、多写字,所以他在那个时代能一直读完高中。

在父亲的教育下,张永兴“写”成了当地的“一支笔”。后来张永兴到了城里,去了国营厂工作,他手中的这支笔一直没有停过,帮同事写报告、诉状等。再后来,他走上街头,摆起了摊儿,做了个正儿八经的写字先生。

张永兴靠写字修身养性

张永兴在文庙直街有处老院子,门口挂了块牌匾,上书“隆中居”三字,喻“淡泊宁静”。

走过一道逼仄的巷子,看到院子角落的大叶子花开得正盛,老爷子说他在在这株花下帮人写了20多年的字。住文庙直街附近的人都知道,张永兴是个爱写字的老人。谁家有红白事儿写对联或者要写个诉状、申请、报告之类的,都愿到他那儿求字。老爷子也以服务大伙为目的,只收个纸墨钱,而遇上穷的事主,他都乐意免费写字。

张老爷子的书房为临街一处小屋,又兼作复印铺面。前些年老伴买了台打印机,帮人印资料,能赚些钱贴补家用。书房颇为简陋,一桌、一椅、一砚台,墙上挂着几件老人的书法作品,无论是端庄秀丽的小楷,还是浑厚磅礴的行书,在豪放流畅的作品之中,挥舞的不仅是笔墨,还有张永兴的快意人生。

邻居都说张永兴闲不住,75岁高龄,仍戴着老花镜,颤颤巍巍地帮人写字。“写字,是一件快乐的事情,可以养性;帮别人写字,更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,也算是老有所为。何况我有1800元的退休金,我不用以写字为生。”张永兴说。

退休后成了写字先生

张永兴祖父在富民名气颇大,在当地还办了一个中学叫做“子虚观中学”,学校在当时规模算大的,请了10多个教书先生,极大地方便了附近的孩子们上学,后来被合并成了现在的李资村中学。

昆明最后一个写字公公 见证写字历史兴衰



在昆明乡下,凡被村里人公认为写字最好,能够帮助村里人在办红白喜事时写对联和记账的,就会被尊称为写字先生。那时,不管在城里还是乡下,写字先生算是个“肥差”,俨然是文化人,很受人尊重。

10多年来,文庙直街上很多的写字先生都纷纷封笔,只有巷口75岁高龄的张永兴仍在坚持写着。

关于祖父的事迹,父亲并未对张永兴详细讲过,就连祖父“捐资办学”的事情,他也是偶然在翻阅富民县志的时候才发现的。“祖父、父亲都酷爱写字,非常低调。”张永兴说。

在富民乡下的时候,张永兴只能靠一些有限的旧报纸练习写字,连张干净的纸都没有,更不用说其他的练字条件了。

年轻时,在国营厂昆明燃料公司从事统计工作的张永兴举家搬到了文庙直街。慢慢的,张永兴写得一手好字的事情就在单位传开了,同事们常找他代写报告、诉状,甚至是私密的家信、情书。他倒也不嫌烦,每有写字的事情找上门来,都爽快应允,以最快的速度帮人家完成。

后来,燃料公司不景气,55岁的张永兴提前办了退休手续,回到



75岁高龄的张永兴仍在坚持“写字”

了文庙直街,赋闲在家养花。

文庙直街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就形成了一个以广告招牌制作的商业形态,这些店铺也主要分布于靠胜利堂的一侧。街上有郭家巷、海天阁巷,顺着文庙直街走到人民中路,对面即是文庙。

回到家中一直赋闲的张永兴见做广告牌制作生意能赚钱,便腾出了家中临街的房子,支了个布幌子就开张了。

电脑逼走写字先生

“那时的文庙直街,一条街至少有20多个写字先生。因为没有电脑,做广告招牌全靠手写,有的店家手上功夫不行,写字这方面全靠街上的写字先生来誊抄。”张永兴说。

这些写字先生来自天南海北,在街上摆张桌子就算开了张,一天

下来少的挣10多元,多的挣上百元,养家糊口不成问题。在张永兴看来,写字先生分作两类,一类是“没有文化,只能写字誊抄的技术人”,另一类是“读了书,能帮忙拟个诉状的文化人”。

张永兴当时不算纯粹的写字先生,他开的是广告招牌制作店,“好歹算个老板”。后来上门做广告的少了,找他写字的却多了,他只好关了店面,上街去帮人写字。

写字先生中有文化的少,像张永兴这类的“可以帮忙代写文章的写字先生”,在这条街上非常吃香。“其他写字先生搞不定的就找我,我的生意非常好。2002年以前一个月挣2000多元一点问题都没有,但后来就渐渐地淡了,电脑的出现逼走了很多写字先生。”张永兴有些伤感地说。

按照现在的标准,写一副对联

30元,面积稍大的50元。张永兴写字的价格并不是一成不变,看人定价,有经济实力的年轻人就收一点笔墨费,没有收入的老人就免费服务。

“现在来找我写字的基本上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,不识字的多,很多人需要帮忙打报告,写诉状或写家书。他们口述,我来整理,写一天腰酸背痛,苦个几十块钱。”张永兴笑着说。

希望年轻人多动笔

在采访间隙,张永兴还不忘写上几笔,想尽快完成他当天的誊抄工作。

当天上午,一个老太太拿着一摞纸找到张永兴,要求帮忙誊抄家书,给了30元的报酬就走了。老太太写的家书有2000多字,密密麻麻的4页纸,改动很大,病句错字也多,这些都需要张永兴在重新誊抄的时候逐句改正。接这个活的时候,张永兴有些犹豫,可看到对方年纪大,给侄子写封信不容易,只好戴着老花镜用笔一行一行地誊抄。

记者的不断打扰,让张永兴的誊抄工作进行得很不顺利。

“老太太说下午来拿,半天过去了才抄了一半不到,今天是完成不了,只能跟她讲明天再来拿。我晚上不能加班,否则第二天眼睛不好使。”张永兴停下笔,一字一字对照,生怕有错别字。

“之前有个老头找我写诉状,要告儿子侵占他的房屋。老人家不识字,我只好先采访他,然后再帮他写出来,为了保证准确,又口述了一遍。这件事情做下来就是一天,也就收了人家30元,这比不上你们记者写一条稿子。”张永兴笑着说。

张永兴膝下只有一个儿子,因为儿子打小不爱好写字,张永兴也就没有强迫他练习。

“现在的人都潜不下心来练字,加上又有了电脑,用手写字的机会越来越少了。我认为不管在什么场合,手写我一定会给人亲切感,所以我还是希望年轻人多写字。”张永兴说。据《都市时报》